

第一章 摊牌

1997 年 2 月 9 日的夜晚，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薄雾。那天是星期天，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聚集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的顶层餐厅里。

国际清算银行被称为“央行的央行”。它创建于 1930 年。根据协议，参与这次聚会的人员都不得记录会议内容，也不得有助手跟随。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被允许有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麦克多诺陪同（这是协议中许可的）。其他的与会者，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 9 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则只能独自前来。最后，欧洲货币局（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的主席亚历山大·拉姆法吕西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安德鲁·克洛克特也在被邀请之列^①。

这些银行家们控制着全世界 95% 的资金流量。^② 他们都有着

^① 国际清算银行（BIS）负责主持十国集团（G—10）的例行会议。它包括周日的晚宴以及第二天的会议。十国集团这个称谓是一个误称，因为，实际上它是由 11 个成员国组成的。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的行长都被允许参加这一晚宴。最后，欧洲中央银行（1998 年以前是欧洲货币委员会）的行长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也在被邀请之列。正式会谈在晚宴后的第二天进行，其会后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② 他们直接控制着世界储备的 30% - 40%，但因他们国家的货币被全球其它国家当作储备货币，对于这些储备的控制是间接的（比如，用改变利率）。

左右股市、汇市的能力。尽管阿兰·格林斯潘在公众面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他的话对于世界市场起着警钟一般的作用。他的几句话可以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些银行家们都很乐意参与这一会议。由于没有烦人的摄像机镜头和手持记录本的记者，抛开了他们的保镖，他们可以畅所欲言。

国际清算银行总裁维姆·德伊森贝赫是这次晚宴的主人。依照十国集团的传统，他坐在椭圆桌的北面正中，正对着窗户，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夜幕覆盖下白雪皑皑的马拉尔山脉。这座山脉便是法国与瑞士的南部边界。正对他的是十国集团会议的主席、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格林斯潘的影响力虽然更大些，却坐在德伊森贝赫的一旁。这是因为国际清算银行这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实际上是由欧洲人控制的。

用过沙拉和主菜，德伊森贝赫轻敲玻璃杯，宣布讨论开始。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艾迪·乔治将确立讨论主题。

艾迪·乔治清清嗓子说道：“我提议讨论一下欧洲经货联盟的问题。”

欧洲的银行家们屏住了呼吸，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乔治以公开质疑欧洲统一货币而闻名。显而易见，他所代表的国家也不准备参与其中。银行家们怀疑其拖延是为了掩盖英国希望在完全做好准备后再加入联盟这一意图。乔治随后的发言迫使大家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他坚持说某些国家缺乏弹性的劳动法导致了高失业率。但是，单一货币使这些国家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从而使其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无法刺激经济增长。“失业状况将会越来越糟糕，”他说道，“以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单一货币是危险的举措。”

过去的 5 年里，任何有关推迟经济共同体建立的讨论已经成为其它行长们的禁忌，他们对经货联盟深信不疑。为了使他们各自的国家能在 1999 年单一货币建立时顺利完成转轨，他们都

狂热地工作着。现在停下来太令人失望了。另外，如果计划按期进行的话，他们都将成为管理这一货币的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到那时，中央银行将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有权设定利率，从而影响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动，影响经济运行——简单来说，除了美联储以外，它比世界上的任何机构对人们财产的影响力都要大。与欧盟委员会不同，欧洲央行不是个傀儡机构，提交的建议为政府的否决权所左右。欧洲中央银行十分独立，不受任何约束。它将是超国家的，享有充分自主的权力。作为欧洲央行委员会成员，这些行长将成为欧洲金融世界的主宰。

虽然他们不愿意谈及延期，但乔治提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行长还是轻松了许多。近几周，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笼罩在一股悲观的情绪中，一些人已经开始怀疑它了。1月份，法国财长让·阿尔蒂怀疑法国能否按期削减赤字以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单一货币计划的标准^①。法国已经大笔削减了预算以达到标准，现在已经无计可施。公众已经受够了，加上失业率不断上升，有迹象表明随时可能会有示威发生。1995年末，反对单一货币之声曾经席卷全法国，担心越来越多。法定大选还有14个月，人们对政府已经失望了。那一周的民意调查显示，如进行全民公决，55%的法国人将反对加入欧元体系。然而，大家都明白，没有法国参加，这一计划必定失败。

当时，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们也正被来自其政府的压力所困扰着。比如，阿尔蒂竭力想创造一个“稳定委员会”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并列机构，以使各国政府对欧洲央行更为放心。阿

^① 然欧元计划在1999年正式启动，成员国达到其标准的期限却在1997年。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参加单一货币的国家，其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

尔蒂已经设法赢得了德国、比利时、荷兰财政部长的支持。但他们一再宣称，这仅是个非正式组织，不会影响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可是，行长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把这看作是法国耍的手段，以加强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毕竟，就是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法国总统密特朗仍公开宣称法国要的就是政治上的主控权。

在其它方面，各国行长们已经注意到计划在 1999 年不能按期实施的危险性存在着。即便是以金融系统的可靠性而闻名的德国也有困难。税率提高使许多投资者转向卢森堡以逃避税收，而且波恩的赤字水平也超出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这是德国统一的高昂代价。失业率已经升至战后最高，而且是自希特勒 1933 年上台以来所未见的。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明大多数德国人反对欧元体系。

法、德两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决定在 1999 年完成预期计划。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法、德两国的人民还不想以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而换取欧元计划的成功。心情急切的政治家们会以假造数据的方式来按期达标吗？如果是，这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暗示？一开始就打破规则，以后还有希望重建吗？拉丁国家已经使用各种预算花招来降低赤字，意大利甚至在今年征收了特别的欧元税。

乔治说，与其在最后一分钟让政客们面对无法承受的压力，还不如现在就决定推迟计划。金融市场也会接受这种延迟，优柔寡断可能会引起混乱。迟到的欧洲货币联盟会比不合时宜的强。等待也可以给 3 个开始时不同意加入的国家——英国、瑞典、丹麦——更多的考虑时间。而且试图加入计划的希腊也可以有时间来调整其经济指标。同时，被人们称为“半成员国”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也有时间证明它们的赤字削减是可持续的，而非强弩之末。

乔治向桌子四周看了看。他想知道谁会有勇气继续这场争论。这时，维姆·德伊森贝赫，这位长着一张非常有棱角的脸庞的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发言道：“虽然我还没有向任何人咨询过，但是我想，延期两年将是个明智的主意，不是吗？”他以自己惯用的简短直接的方式问道。顿时，他的话使其他的欧洲与会者惊呆了。德伊森贝赫是最有希望成为未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人^①。他在这儿泼凉水，更糟的是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看着欧洲人信心的动摇。而且瑞士和瑞典的中央银行家也不属于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德伊森贝赫虽然正轻松地与同僚们享受着美酒和香烟，可他的话却是认真的。

在荷兰中央银行，德伊森贝赫已经与同事进行过关于延迟欧元计划的讨论。他和委员会还委任其经济部门进行了关于延迟计划的利弊分析研究。因为这份报告过于敏感，所以它被列为最高机密，在银行内部也没有被传阅。这是一份正面的报告，它认为按时推行计划比推迟计划有利。^②但德伊森贝赫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在背后支持了一项计划——由荷兰政府组织游说其它政府首脑同意欧元计划推迟。荷兰财政部长格里特·佐姆特别关注意大利，他几次去德国看是否其它领导人考虑推迟，但都碰了壁。德国自己虽然很难达标，却不得不对其它国家持强硬态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甚至派出他的外事政策顾问卡尔·拉默斯去劝说荷兰对于货币计划多一点“大欧洲风范”。这恰恰证明了荷兰关于德国人的立场开始动摇了的猜测，即准备在一些国家未准备好的情况下也强行推行单一货币计划。荷兰在其计划中被孤立。

^① 德伊森贝赫于当年6月被任命为欧洲货币局的主席。而欧洲货币局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

^② 荷兰中央银行的报告是在1996年底进行的，与欧洲货币局的第一份共同报告联系起来共同发表，认为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很糟糕。多数的国家无法在1997年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日期启动欧洲货币联盟。

佐姆和德伊森贝赫时常会面，两人每周都在海牙 Signpost 餐厅共进午餐，去参加欧洲例行峰会时也是。现在，德伊森贝赫离开了海牙去了巴塞尔，与他在各个中央银行的同僚们会面。他希望征求他们的意见。

虽然德伊森贝赫曾经表示过他的疑虑，其余 5 个准备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保留。但是这 5 人中有两个也持观望态度。安东尼奥·法齐奥，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一个著名的欧元悲观论者，喃喃地说他也支持推延计划。他眼看着意大利政府修订出了以意大利标准看也属创新的会计方法。更多的时间将有助于意大利的财政情况更可靠。

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也正等着这一刻的到来。他也怀疑准时启动欧元的明智性，但因为碍于他是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的行长，他在公众面前还是很收敛的。任何显示迟疑的蛛丝马迹都会使市场陷入混乱：投资者会迅速抛售意大利里拉、葡萄牙埃斯库多、西班牙比塞塔，把它们兑换成德国马克。很快，货币链就会被破坏，几年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蒂特迈尔曾经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推迟计划。但是，他不是在欧洲货币联盟启动时而是在延迟计划的倾向很浓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市场掩盖了他的观点。关于他是否该说得更明确一些，一直还有争议。

现在蒂特迈尔的同僚已经在公开地讨论这一问题了，他仍面临着究竟该说多少的难题。他甚至不愿向同事透露他的想法。一方面，他保持个人对计划成功推行的质疑，同意乔治·德伊森贝赫以及法齐奥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对于市场的分量。另外他也不愿反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德国总理科尔所支持的计划。

蒂特迈尔当晚所说的话不多，即使说了也显得很犹豫、很小心地避免下什么结论。他抱怨了欧洲各国的利率不一致，一些国

家在降低赤字中出现的巨大的问题，以及某些国家的债务水平不达标等等。这些问题正在日趋严重，而不是减轻，他补充说。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争论几乎歇斯底里，急于在第一批加入，它们要预算花招。但蒂特迈尔当时想说又不敢说的是：一个日期真这么重要吗？等一两年看看形势不值得吗？冲过 100 米线只是为了失败是不值得的。一个与会者回忆，蒂特迈尔明显在犹豫。

蒂特迈尔正在考虑是否发言时，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针锋相对地指出推迟是个可笑的主意。他极力维护欧洲货币联盟，虽然法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但推迟会使情况更糟，让法国第二次组织计划的实施是不可能的。“推迟与协议的精神是相悖的，”特里谢说，“这给下次的失败开了危险的先例，新的借口还会出现。他明白市场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公众也会反对计划的实施。一句话，欧洲货币联盟将会被送入历史的垃圾桶。特里谢的口吻似乎确信他可同德国人在欧洲央行中共享权力。作为法国国库局监事的他、科尔、密特朗和意大利总理法齐奥·安德烈，将欧洲货币联盟的底线定在 2000 前达成协议。对特里谢来说，协议是科尔和密特朗的共同期望。他和他德国的同事霍斯特·克勒立刻达成协议。从那时起，他就成了这种期望的忠实追随者^①。

对推迟计划持不支持态度的还有两个，比利时中央银行行长阿尔方斯·费尔普莱茨和欧洲货币局的亚历山大·拉姆法吕西。他们支持特里谢。费尔普莱茨近来转而反对一个由德伊森贝赫和蒂特迈尔支持的主意——核心欧洲计划——就是将中欧的国家组成精英集团，而将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排除出去。费尔普莱茨以其惯有的温文尔雅的态度说，行长们仍应该看看其它国家能否

^① 见第四章

成功。拉姆法吕西在过去 4 年中将全部精力用在准备单一货币上，不仅仅是为计划的成功下了个人的赌注，他坚信这一计划推迟将会使信誉丧失。他对于乔治和德伊森贝赫当着外人讨论欧洲问题很生气。他劝德伊森贝赫说：“不要仅看公众意愿，还是多看看经济状况吧，意大利和其它国家会达标的，它们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你不能随便就开除人家呀。”

拉姆法吕西对意大利有新的看法。与他在德国和荷兰的同事不同，他认为意大利确实在进步。1993 年，意大利财政部长卡洛·钱皮说服意大利摆脱工资指数化，从那以后，通货膨胀率就很快地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接近。1993 年，里拉最后一次大幅度贬值，意大利的通货膨胀率仅仅从 3.5% 增长到 5%，这是通过贸易工会组织同意大规模削减实际工资得到的，从那以后，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跌。“没有混乱发生，”拉姆法吕西解释道，“如果它们同贸易工会组织达成妥协，也许真能将赤字降下来。”

拉姆法吕西同意蒂特迈尔的观点，也认为集中需要的持续性应在长期得到证实。但实验到底该多严格呢？“如果说得极端些，”他对蒂特迈尔说，“你只会最后落了单，因为你连荷兰也不能信。毕竟，荷兰盾对马克在 80 年代初贬了 2%，而它在德国的邻居中对降低通胀是很慎重的。”

巴塞尔十国集团会议显示出各方有很大分歧，但问题仍没解决，一些人觉得听到了货币联盟的挽歌。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安德鲁·克洛克特离开桌子时心情沉重。他觉得欧洲货币联盟解散的日子不远了。但是，他对行长们的决心并不确定，美国人觉得有趣：“我们觉得最好是保持有关关注的沉默。这是次欧洲内部的讨论。”麦克多诺夫回忆说：“我的感觉是德伊森贝赫是讨论会中的博学的教授正在主持一个研讨课程。有时，只要问个难题，你就可以让学生说出他们所想的……”当我坐在那里，我会鼓励那些敢想敢干的人。我觉得不论任何事，如果有争论，就应该设

法解决。一旦拖延，就很难再号召人们去再一次尝试为了成功而努力。

特里谢是那天的救星。^① 他同样被他的政府的意见所左右。巴黎是惟一拒绝考虑推迟计划的政府。德国财政部长西奥·韦格尔回忆说：

“不单是荷兰中央银行，其它圈子中也有一些当国家达不了标时采取的应对之策。我们总是说我们会严格执行标准。但是我们意识到，推迟计划会使公众丧失对我们的信心。1996年，我们中包括联盟代表在内的一小群人聚集在总理办公室。我们都认为标准必须严格地被执行，否则，德国的民众是不会接受的。我们还认为德国不能成为提出推迟计划的一方。几天后，圈内的某人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缄口不谈。很多国家内部都准备了几种方案。一些人讨论着该推迟一年还是两年，但法国从不加入争论，他们总是说：“不，我们不应该讨论这种事情。”

第二个月，行长们表明他们已经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了。3月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年度最佳银行家奖的颁奖典礼上（德伊森贝赫赢得此殊荣），汉斯·蒂特迈尔、德伊森贝赫和亚里山德拉姆法吕西都表示强烈反对推迟计划。他们的立场——至少是蒂特迈尔和德伊森贝赫——都是180度大转弯，虽然他们都为推迟的立场在巴塞尔争论了几个小时，这次却对这一想法持嘲笑态度。他们知道他们的犹豫不决已经使市场出现动荡。“关于欧洲货币联盟将推迟的担心与传言是可笑的。”蒂特迈尔强调说。“关于推迟计划的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拉姆法吕西说。“‘它们（传言）与实际情况不符。欧洲货币联盟将在1999年1月1日准

^①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在进行第一届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选举时，特里谢输给了德伊森贝赫。

时启动。”德伊森贝赫更是强调，“单一货币的启动是确信无疑的，我重复一遍，是确信无疑的，这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认可的。”

在这之后，德伊森贝赫甚至说推迟计划将会是一场“灾难”。

一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德伊森贝赫说不记得 1997 年 2 月在巴塞尔的事情了，并且否认曾提出过推迟计划的事情。他说在巴塞尔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出于学术原因。他还辩解说，他从来都认为推迟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危险的。他解释道：

“我故意没有参与那次讨论。该讨论是由财政部长佐姆挑起的，是为了给意大利一些压力以促使它达标。德国所持的态度比荷兰重要得多，但在这一方面，我们立场相同。所以我们联合了起来……你也许会说两国是……为了给意大利最大的压力。我们都在考虑是否该让意大利参加，但我个人从来也没有认为意大利该被排除在外，但我认为应该保持一定的压力。”^①

当德国阵营受蒂特迈尔和德伊森贝赫影响有点不知所措时，法国人站了出来。这从很多方面看起来有悖常理。法国通常提出创意，德国将之变为准则和机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个最好的例子。1990 年，密特朗提出单一货币并且马上就要实施，他担心，在吸收了原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德以后，统一的德国所拥有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并且急于将它与欧洲其它国家拴到一块。科尔为了使他的邻居放心就同意了，但要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保证管理单一货币的组织向各中央银行行长负责。德国控制了德洛尔委员会的决议，使得事情朝着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

^① 德伊森贝赫的记忆也许有间歇性的毛病。他还说对于经济部门的那份列出推迟计划利弊的保密报告也不记得了。在 1998 年 5 月他“主动”表示不打算在欧洲中央银行主席的位子上完成任期，这一事情上，德伊森贝赫的记性又不大可靠了。英国首相曾提醒过德伊森贝赫，他曾私下里说不打算完成任期，他回答说自已忘记了。后来证明，布莱尔的提醒是有用的，见第六章。

但是，在 1997 年年初，进展有些停顿，部分是因为缺少政治上的联盟，德国与荷兰明白如果能让计划进行下去，让法国和其它国家遵守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则是关键。法国等国反对建立政治联盟^①，所以，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共同修改《稳定与发展公约》。协议建立了财政标准，并惩罚违规的国家。但信任一再被打破，密特朗 1992 年宣布欧洲中央银行将不独立于政府。这反映了欧洲人做事的方式。

但是现在，特里谢已经说服了他的法国同伴们支持欧洲货币联盟。那以后的 12 个月里，支持欧洲货币联盟的赞辞席卷欧洲大陆。经济增长加快，税收大量增加。这帮助使意大利和德国等政府消灭了赤字。在私营经济领域，当货币联盟的最终会按时启动的消息逐渐明朗时，人们都显得很兴奋。

^① 见第三章

第二章 欧洲央行的荷兰行长

每当环境改变，我的想法也随之而变，你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98 年 9 月 28 日，即奥斯卡·拉方丹当选为德国财政部长的第二天，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呼吁在全欧洲范围降低利率。对此，维姆·德伊森贝赫（现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反应极为冷淡，正如他所说的：“政客们发表意见很常见，但是有人听得进他们的话才怪呢。”

无论这种意见来自德国还是法国，维姆·德伊森贝赫绝不是个惟命是从的人。但是，他对德国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的业绩非常赞赏。也正是由此，他坚信，一家中央银行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外来的干扰，才能像德国中央银行一样在数十年间一直维持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经济的繁荣发展创造出条件。与之相反，法国政府在战后对银行业的干预则导致了其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直到法国法郎与德国马克挂钩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早在 1991 年在马斯特里赫特协商实行统一货币时，欧洲各国就已经对德国中央银行模式的作用表示了肯定。从那以后，他们还指定德伊森贝赫与欧洲中央银行向全欧洲介绍德国的货币理论。欧洲中央银行与德国中央银行有着相似的运行机制。作为欧洲央行的行长，德伊森贝赫 1991 年负责在 11 个参加国推行向单一货

币的平稳过渡措施，它们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行政会议上，有一些与德伊森贝赫有类似想法的银行家，德伊森贝赫决心与他们一道，确保新的单一货币——欧元像以前的德国马克一样稳定。

然而，德伊森贝赫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尽管欧洲各国国内存在着不可轻视的反对力量，单一货币带来的种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促使各国之间必须加强合作。实行单一货币的国家都认识到，它们必须在税收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并且需要一个自动转换机制，以平衡各国间的经济差异。

从另一方面讲，加强合作还是受到大家欢迎的。各国都认识到，只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目标明确的一股力量，欧洲才有望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与美国放手一搏。同时，加强合作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些国家对欧洲中央行政策的不满与抨击。明显的问题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不同，但欧洲央行只能提供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是根据欧洲整体利益制定政策的，但这很可能使某国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从而招致该国的不满。而且，法国一旦认为单一货币被德国控制而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并且无能为力的话，就会以脱离欧元计划相要挟。一些小国也会如法炮制，尤其是在它们不能从其它国家获得金融资助的时候。总之，德伊森贝赫最大的挑战在于，在调整欧洲央行的政策时，他必须百般权衡，以使制定出的政策安全通过各国利益这一片地雷阵。一旦法国人觉得他是个“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克隆体”，并且披着“传统的日尔曼色彩”，这一任务就会变得无比艰巨。

一个行长的诞生

1935年7月9日，维姆·德伊森贝赫出生在一个拥有4万人口的小镇——黑伦维恩上，该镇位于荷兰弗里斯兰地区的最西部^①。当时，荷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但是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和鹿特丹一带，弗里斯兰却地广人稀。德伊森贝赫的父亲是当地政府的公务员，管理着自来水厂。德伊森贝赫从小就十分喜爱到平静的内陆湖上去划船，这些湖泊位于弗里斯岛的南部，与北海相望。首次航行时，他年仅4岁，同一年，即1940年，德国（在二战中）入侵荷兰。

德国人的到来让他记忆深刻。他回忆道：“整个过程持续了3天3夜，隆隆声一直不断，他们都骑着马。我记得他们还带着煮饭的用具和各种各样的机器……”

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时间要比西欧其它地区更长，从1940年5月一直到1945年初。这使得战后荷兰与德国之间关系颇为紧张。在被占领期间，荷兰商界与政界反应冷淡，从某些角度看，甚至有些通敌卖国。当荷兰大众对德国人咬牙切齿的时候，社会精英

^①从弗里斯兰人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勇敢而顽强的。他们曾击退罗马的入侵者，后来又杀了德国的传道者博尼法体耶斯——他想让他们皈依基督教。他们还团结起来打退了诺曼人。荷兰统治者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把他们征服，即使这样，弗里斯兰人还保留了原有的法律体系、语言和文化。当年强大的天主教哈布斯格王国征服荷兰时，弗里斯兰人却狂热地信奉喀尔文新教，并且暴乱不止。现在，弗里斯兰是荷兰惟一有独立语言的地区，使用的弗里斯兰语是日耳曼语系中与英语最为接近的语言。当然，历史也有较为不幸的一面。这地方大部分都是沼泽，很难入侵，从战略上考虑，占领与否甚至无关紧要。二次大战中德国人骑马入侵而不像在欧洲其它地方那样开着坦克，说明当时这地方还不如后来那样坚硬。

们却保持沉默，并且在战后，也很少有什么反德言论。

在德伊森贝赫成长的北部，人们的反应尤其冷淡。他回忆道：“那儿是如此的平静。与西部截然相反，我们生活富足，好像在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里。”荷兰的经济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但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直到 1948 年还在困境中挣扎。十多岁时，德伊森贝赫利用暑假在几个工厂干活，先是在烟厂，后来在咖啡厂，还有生猪屠宰场。他还在自行车厂干过把车条插进轮轴里的活儿。

19 岁时，他离开当地学校，进入格罗宁根大学攻读经济学。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之后，他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后来，在当上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到达他人生的顶峰时，他因为每年回乡探望失学儿童而饱受赞扬。与此同时，汉斯·蒂特迈尔，年长德伊森贝赫 4 岁的未来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正在国界线另一边的一个叫做明斯特尔的德国小镇上学^①。他们两人好像注定要相遇，彼此的命运也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其中的一人将交给另一人欧洲最为强大的法宝。

26 岁时，维姆已经取得了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个学位。接着他又开始攻读博士，并在 4 年后，即 1965 年取得了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谈的是解除武装的经济后果。在这 4 年期间，他任助理讲师一职。

德伊森贝赫 1965 年获博士学位，一份名为《时代周刊》的杂志报道说他与朝气蓬勃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极其相像：“相似是极其明显的。额前的直发……直率的脸庞。快乐、年轻、

^① 1997 年 3 月法兰克福“本年度银行家”大会上，汉斯·蒂特迈尔作了演讲，表扬获奖者维姆·德伊森贝赫。这一奖项由来自不同国家的 21 家金融出版物每年颁奖一次。蒂特迈尔强调了他与德伊森贝赫有着共同的思维和文化，并说他们二人出生的村庄相距不过 50 公里。其实这两个村庄相距约 100 公里。这个错误可能反映了对两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有意夸大。

魅力四射，是人们所说的会让女人为之着迷的那类人。”他们之间惟一的差异就是德伊森贝赫要高一些：他身高 1 米 93（6 英尺 3 英寸）。但最重要的是，德伊森贝赫有着冷静而自信的气质。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打算出国一段时间。他看到了一则关于到坦桑尼亚教书的招聘广告，于是想申请这个职位。但一位教授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认为教书这个职位不会给德伊森贝赫所需要的经历。因此他推荐德伊森贝赫到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于是德伊森贝赫就申请了这个职位，并且得到了在欧洲部门工作的机会。当时荷兰对 IMF 的影响举足轻重，有很大一批年轻的荷兰人都是从 IMF 开始经济学家生涯的。职员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 IMF “由美国人出钱，由印度人策划，由荷兰人掌管。”德伊森贝赫在那里工作了 4 年，直到他 34 岁。迪尔克·沃尔夫松，一个先于德伊森贝赫在 IMF 工作的荷兰人，在回忆关于德伊森贝赫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时说道：

“德伊森贝赫在 IMF 干得非常出色。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员工，有领袖风范。他所到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美国人常拿他好看的相貌开玩笑，说他是‘欧洲的肯尼迪’。我知道他前途不可限量。他的一切都预示着这一点。”

离开 IMF 之后，德伊森贝赫受雇于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中央银行，在那里为银行的常务委员会提供咨询。就这样，作为一个负责建立宏观经济研究所的年轻咨询员，他开始了在中央银行的历程。但当时他只是银行的低级文职人员，根本不为众多委员所知。在他的同事中间德伊森贝赫向以擅长社交闻名。其实他很害羞。虽然他也可以博得他人的信赖，但自己会变得不耐烦，有时候甚至一意孤行，拒绝与人交流。他自己也说道：“我意识到，如果要直来直去，或者说保持光明磊落的话，我说话就得小心翼翼。”

仅仅一年之后，德伊森贝赫就离开了这个职位，到阿姆斯特

丹大学当了教授。他教了 3 年宏观经济学，仍然没有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什么突破，也不属于任何思想流派。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在计划着下一步行动。除了在大学周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著作。

但就是在这 3 年内，德伊森贝赫迈出了大大的一步，从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荷兰有上千的教授）一跃成为财政部长。他现在是社会共和党党员，很多人说他的发迹靠的是私人关系。当时，社会共和党还是个很小的党，德伊森贝赫是该党主席约普·登·乌伊尔的一名经济顾问，乌伊尔在 1973 年当选为荷兰首相。

新大陆大学的史蒂文·沃林茨是为数不多的仔细研究过荷兰政治的北美政治科学家之一。根据他的看法，荷兰人有崇拜官僚的传统。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荷兰拥有如此臃肿的官僚机构。由此看来，德伊森贝赫应该是“合格的”，他当了几年教授，何况还有咨询员的经历呢。

德伊森贝赫的朋友哈里·凡·佐伊梅伦认为他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晋升的，但这在荷兰很常见。他说：“这是个只有 1500 万人口的小国，社会共和党有 10 万党员，在他们里面，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教授和律师等。他有时写些文章。然后，你能想象的，你就会认识某人，某人又认识其他人

1973 年，德伊森贝赫当上财政部长时，他是内阁中的少壮派。当时很多部长，包括他在内，都只有三十多岁。部长们每周都到海牙的记者俱乐部去，一边喝啤酒，一边谈政治。凡·佐伊梅伦回忆道：“天气好的时候，德伊森贝赫常来这儿，先到海滩散散步，然后和记者们在一间咖啡厅里喝啤酒吃东西。”

但是对委任他为财政部长那些人的依赖，使德伊森贝赫在工作中感到诸多不便。首相仍旧对大部分的预算问题定下了调子，并且在同一年大幅度地扩大了财政支出。当时的荷兰央行委员安